

邵炳军 主编
侯文冉 杨延 编撰

诗经文献研读

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

《诗经》文献研读

邵炳军 主编

侯文冉 杨 延 编撰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经》文献研读 / 侯文冉, 杨延编撰.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6
ISBN 978 - 7 - 5633 - 9878 - 2

I. ①诗… II. ①侯…②杨… III. ①诗经-文学研究
IV. ①I207. 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2406 号

总 监 制: 郑纳新
组 稿: 郑纳新
责任编辑: 匡文妍
装帧设计: 赵 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129/139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 276017)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17.75 字数: 250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539 - 2925659)

《先秦文学元典研读丛书》总序

邵炳军

“元典”属于文化学范畴,是哲学“元点”思维与文献“原典”史料的完美结合,更强调人类精神文化的源头意义、超越时空的典范意义和民族精神的建构意义。^①故我们所说先秦文学“元典”是指那些先秦时期写作并流传至今的、具有原创性意蕴的、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重要书籍。^②因此,在当代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古代文学教学过程中,甚至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中国哲学诸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课程教学过程中,注重引导他们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它体现出一种“原始要终”(《周易·系辞下》)的客观要求,也是引导学生进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清章学诚《校讎通义·序》)治学门径的必然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力扬厚重务实的学风,才能提高学生的原创能力,才能使学生“近乎道”而“知之至”(《礼记·大学》)。这种“知所先后”(《礼记·大学》)的学术训练,无疑对他们今后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进入“知本”、“知至”(《礼记·大学》)的探索之路大有裨益。

一、先秦文学“元典”的基本特质

卡尔·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大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二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实现“哲学突破”的“轴心文

① 昭十二年《左传》:“上美为元。”《易·乾·文言》:“元者,善之长也。”《诗·小雅·六月》毛《传》:“元,大也。”《尚书·虞书·大禹谟》伪孔《传》、《礼记·文王世子》郑《注》同。《说文·一部》:“元,始也。”可见,“元”不仅有万事万物肇始之义,更包含着对人类终极性存在状态的关怀与价值取向,表达了对人文精神和理想人性的追求。又,《书·夏书·五子之歌》伪孔《传》:“典谓经籍。”

② 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明时期”，各民族的先哲不约而同地去探索宇宙和人生的诸多根本问题，产生了诸多文化“元典”。^① 这一时期的中国，正值先秦两汉时期（公元 220 年以前），更是一个“元典”葱郁的时代。尤其是先秦时期（公元前 221 年以前）所产生的文明成果，已经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1. 先秦文学“元典”大多具有原创性、典范性特质

先秦时期涌现出一大批中国文学与文化“元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逸周书》、《春秋》、《左传》、《国语》、《老子》、《论语》、《孟子》、《庄子》、《晏子春秋》、《楚辞》等等。它们奠定了中国文学几千年来文体、意象、思想内容和情感基调，后世各种文体的萌生和孕育都可以在其中找到端倪，其语言艺术上的高度成功丰富了汉语的表现力，其完美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元典”，牢笼千载，衣被后世，奠定了我国诗歌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后世诗歌的风雅精神、比兴手法、体裁结构、语言艺术和文体句式等无不肇兴于此。又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作为我国历史散文的典范楷模之作，它们标志着叙事文学的成熟，对后世的史传文学、散文、小说、戏剧等多种文学样式滋养尤甚。再如，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儒、道两家的哲学、美学思想，在《老子》、《论语》、《孟子》、《庄子》等“元典”性著作中得以确立并持续地发挥着影响力。

可见，这些“元典”性作品虽然处在各个文学样式的发生和初创时期，但它们却显示出了巨大的文学魅力和精神文化力量，它们凝固成中国古典文学的坚固基石，它们是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母体和种子，它们指示了中国文学特质的未来走向，它们确定了中国文学的美学潮流和艺术型范。

2. 先秦文学“元典”具有民族风格、民族魅力特质

鲁卿叔孙穆子（叔孙豹）为晋卿范宣子（士匄）释“死而不朽”时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襄二十四年《左传》），此即春秋中期（前 549 年）人们的所谓“三不朽”。可见，当先秦时代的贵族文士把“立言”作为使生命不朽的有效途径的时候，他们的文学创作自然不仅融入了自己的思想、情感和精神，而且囊括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文化追求，大多数作品蕴含着中华民

^① 卡尔·雅斯贝尔斯(K. Jaspers)《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译本，魏楚熊、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 年，第 7 页。

族的文化精神和艺术精神。^①

同时,先秦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文学观念,实际上是一种囊括一切文献的“大文学”、“泛文学”观念,也就是涵盖现代学科门类划分中所谓“文学”、“史学”、“哲学”融合为一的文学观念。^②如《周易》可以说是一部哲学著作,但你很难说其中的四言体“爻辞”不是诗歌作品,你也不能否认“康侯用锡马蕃庶”(《易·晋》卦辞)的史料价值。^③又如,《左氏春秋》可以说是一部史学著作,但你很难否定其高超的叙事艺术没有文学元素,你也不能否认其所载周王、诸侯国君、公卿、大夫、文士创作的成文本身就是独立成篇的散文作品。^④因此,我们可以说,正是当时文史哲兼容的文学观念,才使这一时期的“元典”性作品具有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兼容的特质,它们中大多兼有文学“元典”与文化“元典”的双重身份。

所以,先秦文学“元典”作为一个民族创造力最卓越的青年时代所涌现出来的文化“元典”,凝结了中华民族在以往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优秀的集体意识。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将这些族类记忆和原始意象首次上升到自觉和理性的高度,又通过中华民族所特有的象征符号将本民族的经验文明和文化智慧物化成文字作品,以典籍的形式固定下来,逐渐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品格。故这一时期的“元典”作品不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大厦中起顶梁柱作用的关键性构件,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垂范久远的行动指南与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⑤这便是积极入世、用世、济世的政治热情和忧患意识,以儒为主、兼融释老的思想情怀,诗性沉郁、创新求变的审美况味与创作追求,浓郁自觉的理论批评意识,包容雅俗、综合众体的浑灏大度,等等。

可见,先秦文学“元典”的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不仅对中华民族后世直至未来都产生着深远影响,而且它们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审美意识与精神财富,能够在任何地域、任何时代获得强烈的情感共鸣和心灵震撼。

① 说详:邵炳军《关于〈春秋文学编年史〉研究的思考》,《西北民院学报》,1999年,第4期,第59—63页。

② 郭英德、谢思炜、尚学锋、于翠玲《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第8页。

③ 说详:邵炳军《〈青蝇〉、〈冥之初筵〉、〈抑〉作者卫武公生平事迹考论》,《文史》,2000年,第2辑,第155—164页。

④ 说详:邵炳军、梅军《左氏春秋文系年注析·导言》,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第1—41页。

⑤ 冯天瑜《论“文化元典”——兼释“元典”》,《东南文化》,1992年,第2期,第1页。

二、阅读先秦文学“元典”的现实意义

朱自清《经典常谈·序》指出:“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因此,他认为:“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①这些呼吁在当代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的教学中更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和热烈的响应。

1. 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克服现代教育弊端的重要途径

20 世纪初叶,随着“西学”传入中国,我国的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实现了改革和重构。在学习西方的急切态度和饱满热情中,我们快速地完成了对旧教育的革命性改造,建立了全新的高等教育体系和课程体系,这无疑是一种社会进步。可十分遗憾的是,我们在“打倒孔家店”的一片欢呼声中,将洗澡盆里的“婴儿”与“脏水”一起倒掉了,以传统经学为主体的先秦文学“元典”教育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就目前高校的现状而言,中文系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普遍存在多、空、旧、窄的问题,讲析“元典”性作品的课时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则是相对空疏的“文学史论”;一些中青年学者常常以批判传统文化相标榜,而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他们却并不知晓,从而产生了严峻的“文化失语症”;我们身处高等院校,常常会碰到一些以“大师”自居者,但事实上我们所处的时代的确又是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的时代。

纵观现当代学术史,我们的前辈学者大多是从熟读先秦文学“元典”起步而成为泽被后世的一代“大师”的。这些“大师”们,无论是从事人文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他们的品德情操高洁,人文情怀浓郁,国学根底深厚,这是他们能够成为“大师”的最主要的原因。如笔者所供职的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院士,他原本是学习历史学的,后来才转而攻读力学。他不仅仅以“钱氏定理”闻名于世界力学界,而且以其深厚的人文修养为世人所敬仰。每当傍晚时分我们在由他创意设计的美于人文色彩的美丽校园里漫步时,每当我们在校园中心的文化广场领略大自然的美好景色时,尤其是每当我们在“泮池”观鱼时,无不钱老谙习中国古代诗歌“元典”性作品《诗经·鲁颂·泮水》而叹服。从这个意义而言,钱老是上海大学当之无愧的“象征性文化符号”。

可令人十分愧疚的是,我们这些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接受了现代高校

^① 朱自清《经典常谈》,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1 页。

正规教育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博士后们,尤其是毕业(出站)后在高等学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教授们,有不少人既不懂小学,又不通经学,他们也敢妄谈文学,甚至以“国学大师”自居,何其悲哉!人文社会科学界的许多学者尚且如此,更不要说那些自然科学界“有知识而没有文化”的学者了。当然,笔者绝非厚古薄今之狂徒,更非妄自菲薄之小人。因为究其根源,这绝非个人一己之悲哀,而是整个浮躁时代之悲剧!故我们必须坚定一个信念:注重指导学生学习包含着丰富民族文化生命基因的先秦文化“元典”是实现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当然,我们的“国学”教育并不是在短时间内可以奏效的一种技巧,而是一种通过长时间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与循序渐进的学术积累而形成的“底色素质”。只有真正拥有了这种“底色素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给青年学子以深刻的内在影响力和整体塑造力。

2. 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培养学生具有“支援意识”的重要手段

世界现代学术史与教育史上非常具有戏剧色彩的社会形象是:当五四运动后我们正忙着按照“西学”思想建构中国现代学术体系与教育体系的时候,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却早在上世纪初叶开始创设“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门本科生必修课,鼓励学生致力于研读欧洲文学、哲学、社会理论等传统经典名著;到了40年代以后,美国的许多大学相继开始开设此类课程。此后,芝加哥大学鉴于当代大学训练研究生的方向越走越偏窄的弊端,进而强调原创力的培养问题,规定研究生必须完成一定的经典研读课程。美国学者博兰霓(Michael Polanyi)又提出潜移默化积淀的“支援意识”是创造张力重要来源的理论主张,他认为创造张力并非简单的创造力,而是较深层次的开辟新境界的能力,是由深厚博识而水到渠成的内在爆发力,是致力于开展宏观、质变、大规模受众的飞跃性创造。^①

我们知道,培养青年学子原创能力最主要的途径,就是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学术生涯形成期孕育并生成广阔的知识视野、深邃的探究能力与敏捷的思维能力;而“元典”性作品往往抓住了特定文化乃至人类生存状态中一些最基本、最深层次的问题,并作出了最合乎时代要求、最富有个性特征的完美解答,它们可以常解常新,既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又能够避免在社会发展中造成人类文明的中断或解体。^②正是由于“元典”性作品的文化沉淀为我们提供

^①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个培养博士的独特机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兼论为什么要精读原典》,三联书店,1988年,第301—302页。

^② 刘承华《原典阅读:培养原创力的重要途径》,《教育与现代化》,1997年,第2期,第28—31页。

了急需的“支援意识”,所以,尽管在青年学子后来的学术专著中可能根本不会提到本科生、研究生时代所读过的“元典”性作品,读者自然无法知道是哪些“元典”曾对他们发生过哪些影响,甚至他们自己在深入到自己的专业研究之后也不大能够清楚地意识到早期熟读数目有限的“元典”对他们成熟时期的学术思想产生了哪些影响,但“元典”中精微的深思与宽广的关照对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是他们自身终生都受用不尽的。^①然而,目前在中国的大学里,即使是在很多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基础深厚的综合性大学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院系的课程设置中也极少有引导学生研读古今中外文学与文化“元典”的课程。这种现象就不能不引起我们深刻的反思。

3. 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典”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客观需要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在认识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技术和物质的盲目崇拜,“重知识、轻修养,重科技、轻人文,重物质、轻精神”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意识,其结果自然会出现文化使命感的丧失、人文精神关怀的淡漠等社会现象,自然会使阅读消费出现感官化、平庸化、娱乐化,自然会造就一批“空心人”、“欲望人”和“物质人”,自然会严重影响到新生代人口的心理素质与文化素养。^②这种发展趋向,是每一位政府官员、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和每一位学生家长所不愿看到的,更是我们每一位社会成员有责任、有义务去努力遏制的。

要遏制上述不良的社会现象,可以有许许多多的途径与举措,譬如立法机构制定法律、法规加以规范和限制等。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当特定历史阶段的某一种社会现象到了“法不责众”的时候,往日具有社会秩序强制规范力的法律法规也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因为,法律法规告诉人们的是什么事情你不能去做,而不可能告诉你应该如何去做;它可以去约束人们的行为,却不可能去约束人们的思想。可见,法律法规对社会成员的约束作用、教育作用是表层的、有限的;而每一个社会成员自幼接受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的培养,其约束作用、教育作用才是深层的、无限的。上文我们已经谈到,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都是以完美的形式展现了一个民族最为优秀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理想,它们深厚浓郁的人文情怀和健康向善的感情基调具有为现代社会“立人”的价值功效。从这个意义来讲,注重引导学生阅读先秦文学“元

① 郭齐勇《大学的教育理念与目标》,《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0期,第16页。

② 张俊《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重视文学经典阅读》,《语文学刊》,2004年,第4期,第38页。

典”,这不仅仅只是个培养青年学生的问题,更是个关系到整个社会人口素质的大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当代社会的现实问题,更是关系到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

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些接受过正规教育的中文系大学生、研究生,不论将来从事学术研究还是从事其他社会工作,他们无疑都是引导未来社会文化消费的精英与脊梁。因此,引导他们阅读“元典”性作品应该是大学教育中的重要内容,而加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源头——先秦文学“元典”教育则更加应当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①

当然,越来越多的高校教师,特别是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的管理者已经开始注意到中文系古代文学“元典”教学的重要性,许多学校已经开始了有意的尝试。如笔者所在的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已经被列为上海市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本科教育高地建设基地,并邀请全国数十名专家学者就“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这一命题进行了理论探讨,草拟了以文学“元典”导读为主、文学史论简析为辅的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同时,在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的9门专业学位课程中,有6门是以文学“元典”研读为主的学位课程,其中包括“《诗》、《骚》文献研读”、“诸子文献研读”等先秦文学“元典”研读的教学内容。

三、研究先秦文学“元典”的学术史价值

由于先秦文学“元典”具有首创性、涵盖性、深邃性特质,所以自它们产生的时候起就成为当时社会之“显学”,而研究先秦文学“元典”则一直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学术史之“显学”,尤其是先秦文学“元典”中的经学文献更是在历代学术研究中处于统领学术研究的地位。

1. 先秦文学“元典”自身具有“显学”特质

《韩非子·显学篇》:“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

^① 说详:邵炳军、张静、路艳艳《文学“元典”教学在古代文学课程中应给予更有力的关注》,《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2期,第54—56页。

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孔、墨不可复生,将谁使定世之学乎?”可见,在春秋战国之际,孔子、墨子的弟子遍布各诸侯国,儒、墨之学传授十分兴盛,且在它们各自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分化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由于孔子、墨子及其弟子在学术研究的许多领域里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的社会影响日益扩大,儒、墨之学自然成为“世之显学”。

至战国中期,不同学派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百家争鸣盛况空前。“世之显学”由最初的儒、墨两家发展成为阴阳、儒、墨、法、名、道等六家,进而发展成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等十家。不同学派学术思想迥异,自然形成了各自显著的学术特色:“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尔雅·释诂》邢《疏》引《尸子·广泽篇》);“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臧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吕氏春秋·不二篇》)。当然,尽管各派学说观点纷然,但他们的治学方向是一致的,即所谓“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汜论训》),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救时之弊”(《孟子·离娄下》邢《疏》)。正因为诸子百家都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尤其注重政治问题,各家都着力于治世,其争鸣的内容都在于如何治国,故他们的见解大多受到各国统治者的欢迎,往往直接影响当时政治家的思想行为,使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之显学”。譬如,法家的宗教观念在战国变法时期对宗教活动产生了重大的作用,阴阳家则在“五德终始”(《汉书·艺文志》)说的影响下逐渐以五帝崇拜取代了传统的上帝崇拜。

尤其是作为先秦时期诸子百家中较大学派的儒家学派,尽管在秦朝“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篇》)、汉初“崇尚黄老”(清胡渭《易图明辨》卷六)之后曾一度消沉,但至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后直至五四运动前的两千多年间,儒家思想一直在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界居于统治地位,儒家学说对中国传统思想观念的延续与文化心理的演变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儒家学派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影响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学术流派。因此,我们可以说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不仅自产生之时起在它们所处的社会里成为那个时代之“显学”,而且以其博大精深在后世一直延续着它们自身的“显学”魅力。

2. 研究先秦文学“元典”一直为中国文学学术史之“显学”

可以说从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问世以后,就有了对它们的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如《诗·周颂》、《鲁颂》、《商颂》在祭祀活动中的应用,西周春秋时期

礼仪活动中的赋《诗》言志活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散文创作中引《诗》、《书》、《易》行为,吴公子季札观乐论《诗》,孔子“兴、观、群、怨”的《诗》学观念,都可以说是原生态的文学阐释与学术研究。当然,真正意义上的先秦文学“元典”性作品文献整理与研究,应该说肇始于西汉。

西汉儒学作为经学一统天下之后,重新研究和整理诸子百家的著作与学说,并强调从中吸取思想营养以改善儒学的重要人物首推刘向、刘歆父子。刘向在对《管子》、《晏子》、《荀子》、《韩非子》、《列子》、《邓析子》、《关尹子》、《子华子》、《战国策》等著作进行了系统整理的基础上,认为它们皆有符合儒家经义的地方。如刘向《管子叙录》指出:“《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又如其《列子叙录》指出:“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兢,合于六经。”同时,刘向还在其所著《说苑》、《新序》中假借诸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学术见解,实际上这也是对诸子学的一种肯定。刘歆继承父业,在其所作《七略》中把儒家和诸子各家并列为十家,并认为各家可以互相补充:“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汉书·艺文志》引)同时,他还特别强调从诸子各家中汲取思想营养的重要性,认为“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汉书·艺文志》引)。在刘歆看来,只有在吸收各家思想长处的基础上,才能使儒学由僵化的经学、世俗的神学变为真正能够治国安民的“经世致用”之学。

宋代学者开创了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一个新时期。其中,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是宋学先驱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苏东坡全集·别集》卷三十四《六一居士集叙》)。苏轼所谓“通经学古”,即不事章句训诂而探求儒家经典的新意,这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宋学”的一大特征。如欧阳修所著《易或问》和《毛诗本义》,就是“宋学”的早期代表作。苏轼所谓“救时行道”则是“宋学”建立初期学者的共同追求。如欧阳修、胡瑗、石介等都积极参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后来王安石的变法改新,都属于“救时行道”的实践活动。苏轼所谓“嘉祐末,号称多士”,正是“宋学”的新学、理学、蜀学三个学派的创始时期。

明末清初顾炎武毕生所致力于“实学”的主张,与“通经学古”、“经世致用”的思潮相契合,并由此影响了清代的学风和治学方法。虽然清代学人在专制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将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脱离开来,但是他们在博稽经史的氛围中所从事的朴实的考经证史的治学特征,则大大有别于宋明理学空疏务虚的

路子。在这一点上,顾炎武“实学”主张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吴派学者中,学识最博、成绩最大的要推钱大昕。他淹贯经史,博通群书,研究领域极为广泛,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江藩《汉学师承记》卷三)。清中叶今文经学的复兴,“经世致用”思想再度崛起,代表人物有龚自珍、魏源等。

可见,无论是汉唐朴学,还是宋明理学,尽管治学理念不同,治学方法相异,但他们大多是遵循以小学通经学、以经学通文学的优良治学传统,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使研究先秦文学“元典”成为当之无愧的“显学”。

四、研究先秦文学“元典”的方法论原则

五四运动以来,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这一时期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者们一方面继承了前人研究的丰厚遗产,另一方面引进和吸收了西方先进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和学术方法,从而开创了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新局面。这一时期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家们,往往都有宏阔的气度,敏锐的眼光,大胆的魄力,渊博的学识和活泼的思维。特别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来的30年中,随着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深入展开,学者们思想空前活跃,使先秦文学“元典”研究进入了一个成果卓著的新时期。但是,毋庸置疑,先秦文学“元典”研究仍存在许多缺憾,比如疑古派对春秋文学史料研究的影响,片面强调现代西方文学研究新理论和新方法的局限,对进一步发掘先秦文学“元典”史料重视不够,架空立说,等等。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先秦文学“元典”的方法论原则。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认为,“科研既是一种联系,一要求掌握大量的材料,二须熟悉各种理论、原理(此为联系的路径,探求新的联系的手段),并在不断实践中达到运用自如。”“学术上的突破,无论来自逐渐摸索还是来自顿悟,都是思维联系的结果,都是学问会通的结果”。^①我们认为,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但方法论原则只有一条,即从广博会通到突破创新,由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②

① 赵逵夫师《会通与突破》,《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6期,第10—18页。

② 说详:邵炳军《从广博会通到突破创新,由经验实证到理性思辨——从〈楚辞〉研究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看赵逵夫师〈楚辞〉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中国楚辞学》,第4辑,学苑出版社,2002年,第150—170页。

1. 广博会通是突破创新的前提,经验实证是理性思辨的基础

所谓经验实证的研究方式,主要是指运用目录学、版本学、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学科对文学资料进行整理和考订。特别是乾嘉学派,发扬汉代经学的朴实学风,在名物训诂中博采众说,在文献整理中集其大成,钩沉拨误而新见迭出,将经验实证的研究方法推向了极致。郁贤皓师《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指出:“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深入的微观研究基础之上,才能总结出正确的结论。”^①当然,学术史的研究固然不等于史科学,但史料的研究无疑应当构成学术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也是学术史研究赖以建立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先秦文学“元典”研究界的许多有识之士,承乾嘉考据学派之余风,扬注重史料的“实学”之精神,在研究中自觉运用钩沉索隐、训诂考证的研究方法,成果卓著。然而,就整个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方法论而言,我们更有必要呼吁和提倡坐冷板凳、搞真学问和脚踏实地的治学态度,大力开展文学史科学的研究,扎扎实实地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某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为理论研究构筑坚实的学术根基。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演进作出宏观的把握和透彻的分析。在先秦文学“元典”研究过程中,如何继承与发展经验实证的方法,笔者以为起码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对现有的先秦原始文献尽可能“一网打尽”,从材料的会通走向学术的突破。任何事物的共性均寓于其个性之中。因此,要考察特定历史时期的任何一种文学现象,必须尽可能多地观察该文学现象所涵盖的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尽可能多地搜集、整理与发掘现有原始文献,从材料的会通走向学术的突破。

二是及时了解新出土的文献信息,并将其与有关典籍中的史料联系起来。孔子壁中书、汲冢书、殷墟甲骨文、敦煌及西域之汉晋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长沙马王堆之汉简帛书、郭店楚简等的发现与出土,对学术研究取得突破性成就起了很大的作用,并由此产生了古文经学、甲骨学、简牍学、敦煌学等许多新兴的专门学科,对学术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倡导“二重证据法”的运用,不仅应注重发现传世文献中的新史料与新价值,更应注重发现地下出土、馆藏尘封、散落民间的新史料。

三是充分分析与综合利用已知条件,用刨根究底的办法引出新的研究课

^① 郁贤皓师《论唐代文史的微观综合研究》,收于刘进宝、施和金主编《历史文献学丛稿》,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4页。

题。科学研究就是探究事物的内在规律,这便需要人们去寻找诸多事物之间的联系。它必然要求人们去掌握大量的已知材料作为探求新联系的起点,也必然要求人们去掌握各种已知的理论和原理作为探求新联系的手段。因此,我们必须注重综合运用已知条件——已发现的先秦原始资料和前人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引出新的研究课题,使自己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四是运用“知人论世”的研究方法,从考订作者的身世入手研究作品。孟子早就说过:“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学特色或多或少要受到大的文化背景的影响,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会由于地域、气候、政治、宗教、文化等原因形成自己特有的思想意识、心理特征和审美习惯,任何一位作家的创作活动势必要打上民族风俗、时代特征和文化背景诸方面的烙印。因此,我们在进行先秦文学“元典”乃至整个古代文学的研究过程中,既要了解作品和作者的身世、经历、思想感情、人品德行等的关系,同时又要认识作品和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把文学家放在一定的时代背景、社会环境、生活经历和人际交往中,来考察他的思想、行为和创作。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才能作出历史性的结论。

2. 突破创新是广博会通的目的,理性思辨是经验实证的归宿

所谓理性思辨研究方法,就是从整体上审视研究对象,让主客体 and 主客观遇合为一体的研究方法。就我国学术史而言,由汉代章句训释向宋代义理探求的跃进,标志着先秦文学“元典”研究实现了从单纯的经验实证方法研究向将经验实证方法与理性思辨方法结合的综合性研究的转变,标志着先秦文学“元典”研究逻辑由表层结构到深层结构的发展。先秦文学“元典”研究在资料整理和考订的基础上运用理性思辨研究方法,应包括文学现象的记述和评论与文学规律的探索和总结这两个层次的理论研究,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要以评述文学现象、探索文学规律为归宿。就研究的动机而言,运用经验实证方法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订,就是为了运用理性思辨方法进行文学现象的记评和文学规律的探求;就研究主体而言,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中国古代文学的规律都具有解释的历史性;就研究客体而言,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中国古代文学的规律都具有语言的社会性。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应该注重自觉地运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当代哲学思潮,应该牢固树立以理性思辨方法探求中国古代文学规律为其归宿的学术理念,去分析中国古代文学历史长河中每一位作家、每一个作家群体所处的时代特征,去把握作品中所反映出的作家的思想情感。

只有这样,才能够正确地在经验实证基础上进行理性思辨,才能够从文与史、政治与文学的结合上去整合中国古代文学的特色及其发展规律。在先秦文学“元典”研究过程中,如何继承与发展理性思辨研究方法,笔者以为起码要注意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总体设计,分步实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治学犹如耕耘,在那广袤肥沃的原野上属于你的只有“一亩三分地”,你不要妄想到处去撒播你的种子;如果你太贪心了,其结果必然是“广种薄收”。即使是在只属于你的“一亩三分地”里,你也必须精心谋划如何耕耘,如何劳作,如何划分地垄,在每一垄土地里播种什么作物,在有限的田垄里如何间作套种,等等。这些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耕作的通盘考虑,就如同对你所选择的毕生所要从事的研究对象的总体设计。同时,如同路要一步一步地走,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对你所选择的毕生所要从事的研究对象也要逐一分解成为若干个研究单元,这就是所谓的“分步实施”。当然,对研究对象的“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前提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富于自己个性特色的学术理念。否则,你的“总体设计”只会是“画饼充饥”,你的“分步实施”只会是“瞎子摸象”。只有在正确的学术理念指导下,对研究对象进行“总体设计”与“分步实施”,才能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四面围剿、八方出击,展开全方位地科学论证,才能“使历史上的时代风貌,在读者脑海里形成了极其鲜明的‘立体感’。”^①才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

二是将整个先秦时期的整体文化背景与诸侯方国的地域文化紧密结合进行整体研究。人地关系是人类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基本关系,文人的空间聚合与分离给文化带来刺激,给文学发展带来生机。^②故重视时地关系一直为先秦以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优良传统。但相比较而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期,先秦以后文学地域性风格的研究却走到了先秦文学地域风格研究的前面。先秦文学乃中国文学地域文化特色形成的源头,关注并全面地、系统地研究先秦文学“元典”的地域文化生态与地域风格,自然是从事先秦文学研究者责无旁贷的历史责任,也是我们今后需要努力的主攻方向之一。^③

三是通过对作家政治思想的发掘使人们对作品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① 汤炳正《屈原与他的时代·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2页。

② 戴伟华《唐代文学研究中的文人空间排序及其意义》,《扬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第22页。

③ 说详:邵炳军《关于〈诗〉“国风”地域风格与周代文化生态地域性研究的回顾与思考》,第八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2008年7月。

先秦文学“元典”的一个重要特质,就是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指向性与政治功利性。其中,有些作品甚至是直接为王权政治、诸侯政治及新兴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舆论工具,有些作品则是反映那个时代贵族统治者在社会、政治、经济、伦理、道德各方面意识形态的历史文献。因此,在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过程中,注意通过对作者政治思想的发掘,会使人们对作品内容有更深层次的理解。

四是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使小材料派上大用场。在先秦文学“元典”的研究过程中,每当考订重要问题时,可以随文解决一些看似不起眼的小问题。当然,这同样包含着作者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功底和识力,也是整体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五、编著本丛书的缘由、目的、原则与体例

1. 编著本丛书的缘由——从笔者的学习经历说起

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后,笔者有幸考取了甘肃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的甘肃师范大学,1939年至1948年期间的校名为国立西北师范学院,1949年至1957年的校名为西北师范学院,属教育部直属的全国6所重点高师院校之一。我远在西北腹地的这所母校,其前身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立北平大学、北洋工学院等三所学校自北京西迁陕西后共同组建的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1939年西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独立设置,改称国立西北师范学院,并于1941年西迁兰州。1945年北京师范大学复校迁往北京时,部分师生留了下来,依然沿用西北师范学院这一名称。1958年划归甘肃省领导,遂改名为甘肃师范大学,1981年复名为西北师范学院,1988年更名为西北师范大学。所以,这所发端于1902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的百年老校,昔日是一所名家云集的高等学校,也是一所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知名高等学府。其中,中文系素有“陇上毓苑”之美称,人才辈出,师资雄厚,赵荫棠、黎锦熙、丁易、陈涌、杨伯峻、彭铎、郭晋稀等一大批著名学者曾在此任教。

笔者于1978年3月进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读书时,一、二年级主要开设基础性必修课程,三、四年级则开设了大量的研究性选修课。如郭晋稀师的“《诗经》研究”^①、彭铎师的“《潜夫论》研究”^②、郑文师的“《楚辞》研究”^③、蓝

① 郭晋稀师《诗经蠡测》,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② 彭铎师《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本,1985年。

③ 郑文师《楚辞我见》,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